

山西祁县“过年”习俗的民俗模式解读

钱永平

(西北民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过年”这一民俗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一定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需求, 它既有稳定性的一面又有变异性的面, 具有生活策略性的功能, 其实质是个体以社区群体的行为习惯和心理定势来安排自己的行动。

关键词: 山西; 祁县; 过年; 民俗模式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08(2005)01—0026—05

春节作为一年中最盛大、隆重、热闹的节日, 自古以来就受到我国人民的高度重视。在人们的观念中, 年节是一个必经的重要关口, 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标志性符号。人们相信, 从除夕之夜到第二天的元旦, 乃是“一夜连双岁, 五更分二年”。也就是说, 一过除夕夜的子时, 就意味着“田增五谷人增寿”, 旧的一年算是过去了。

在山西祁县农村, “过年”作为一种小传统^①, 基本延续了历史上的“过年”习俗。

一、山西祁县“过年”习俗的民俗考察

农历正月初一, 旧称元旦, 现称春节, 在祁县当地被称为过“旧年”, 据笔者在祁县前营村进行的考察, 祁县农村“过年”习俗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年前, 大年三十晚上, 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具体过程如下:

(一) 年前准备

新中国成立前, 祁县老百姓从农历腊月初一吃爆米花就拉开了“过年”的序幕, 觉得从这一天起就该为“过年”做准备了。习惯上, 当地百姓把腊月称之为“忙腊月”或者“腊月荒天”, 而一过“腊八”, 吃了“腊八粥”后, 家家户户就加紧操办年货, 裁制新衣。从此, 祁县城内天天像在赶集, 商家门面大开, 街上摊贩如林, 货物琳琅满目, 叫卖声不绝于耳, 大街小巷行人如蚁, 城里一派热闹场面。而走在乡村街道上的村民互相打招呼时一般会说: “去进城吗?” 当地有“过了腊八就是年”的说法。腊月廿三

以后, “过年”的准备进入了最后阶段, 当地流传的民谣有:

“廿三, 打发爷爷(灶王爷)上了天”。这天要在灶墙贴上新的灶王爷画, 点蜡、放鞭炮、供献饴瓜瓜, 用饴糖蜜住灶王爷的嘴, 让他“上天言好事”。

“廿四, 割下对子(对联)写下字”。人们通常选择这天写对联。

“廿五, 揩抹打扫寻笤帚”。在这天, 人们要对所住的屋子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犄角旮旯都不放过。当地人俗称“扫舍”。

“廿六, 割上六斤熟牛肉”。这天, 通常要准备熟食, 如煎肉、蒸馒头等。

“廿七, 关上门门洗了脚”。这是说人们应当洗个澡, 清理一下个人卫生。当地人常说“有钱没钱, 剃头过年”。

“廿八, 胡拾掇”。要把还未忙完的活尽快做完。

“廿九, 提上罐罐打下酒”。实际上“过年”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人们会再购置些零碎东西。

“卅日, 角(音 jue)儿捏下三簸箩”。指全家人围坐一起包饺子、贴对联、在院子和街门上挂门笺儿、院心放块大黑煤, 意为“满院生辉”, 街门外对面的墙上一定要贴上“抬头见喜”的对联, 屋子的门墩上放置缠红纸条的小煤块, 据说可以避邪。

(二) 年节的主要活动

1. 腊月卅日, 要给死去的亲上人上坟, 送年饭。

[收稿日期] 2004—12—28

[作者简介] 钱永平(1977—)女, 山西祁县人, 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院2002级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研究。

2. 接神, 除夕午夜十二点整, 家家置桌放上莲花供品、枣山等面制品, 莲花供似莲瓣倒扣在馒头上, 枣山则是用大小不等的面制如意堆积成上尖下圆形, 周围嵌满红枣, 供在天地爷的牌位前, 然后烧黄裱纸、焚香、放鞭炮进行声势浩大的“接神”活动, 枣山要放到农历二月二的时候再吃, 谓之“攀山”, 并且在屋门顶上放蒸熟的面兔, 取开门大吉之意。

3. 熬夜守岁, 据说这样可以延年长寿。全家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 主要是饺子, 许多人家在饺子中会包入钱币, 看家里人谁会吃到这个饺子, 认为吃到包有硬币的人会钱财两旺; 并且做“隔年捞饭”, 在“隔年捞饭”的顶端放一颗核桃, 周围放压红枣, 旁边放一个蛇盘兔型的花馍, 寓意富贵有余。

4. “蹲旺香”。正月初一大早, 主人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院门“蹲旺香”^②, 立在院中, 放鞭炮, 并念道: “开门大吉, 一年顺顺当当”。之后, 人们纷纷出动, 到街坊邻居家互拜新春, 映入人们眼帘的皆是红色的对联、窗花、年画, 听到的是接连不断的鞭炮声。由于正月初一这一天只有在“蹲旺香”后才能出门, 所以当地把这种仪式叫做“蹲旺香”。

5. 正月初二, 妇女偕夫带子, 带上礼品回娘家拜年。

6. 正月初三, 通常人们开始走亲戚拜年。尤其是新婚夫妇, 都须到双方的长辈亲戚家去拜年。

7. 祭星, 正月初八, 写好北斗七星的牌位, 供上小米做成的“捞饭”^③馍馍, 点上七支蜡烛, 敬纸、烧香、祈求吉利。

8. 正月初十, 当地民间传说中讲这一天晚上是老鼠娶亲的时候, 为此, 人们在放粮的大瓮角处点灯、供食、烧香, 口中念道: “你娶你的媳妇, 我睡我的觉, 我不搅害你这一天, 你也不要搅害我这一年。”希望通过人对老鼠的祈求和许诺来达到人和鼠的和谐相处, 这是晋中地区千百年来农耕文化在当地农民心理上的折射。可以想见, 在古代, 晋中地区在农业发达的同时, 鼠患也必定猖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没有有效的措施来治理, 因此, 人们就自然而然地采用了向老鼠祈求的方式来讨好老鼠, 希望老鼠能和人和睦相处。现在的祭祀老鼠仪式就是历史的遗留。

9. 正月十五闹元宵。清代, 祁县城内设灯棚, 供人们观看, 至今在当地人中传有“祁县的棚, 太谷的灯, 徐沟的铁棍爱煞人”的俗语。村中则以宗族

或街道组成神社, 社首执事由村民逐年轮流担任, 在村中主持元宵祀典, 垒旺火, 挂灯, 扎九曲黄河阵, 搭秋千, 组织龙灯、旱船、背棍、抬阁等社火活动。

(三)“过年”时的禁忌

1. 正月初一, 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年”, 不然, 娘家会有血光之灾。

2. 正月初二、初三忌作针线活, 否则会当寡妇或者子孙辈出现光棍或寡妇。

3. 初一至初五, 不打扫、不洗衣; 到了初五一并打扫“倒穷土”。

4. 正月初五, 俗称“破五”, 忌讳出门串门儿, 如若违背的话是非常不吉利的; 这一天, 要做针线的话, 就会捅下个“穷疙瘩”, 受一辈子穷。

5. 正月初八, 也忌针, 否则会瞎眼睛的。

6. 正月初十, 俗称“十不动”, 不能串门子, 走亲戚。

总之, “过年”时, 人们可以好好地吃, 好好地玩, 并且注意自己的言行, 一切都要争取“吉祥如意”。

二、“过年”习俗的民俗学分析

(一)“过年”习俗的民俗模式性

民俗模式性, 指的是民俗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和形式, 能够被这种民俗所流行社区的人们在生活中无数次地重复。^[1] 它由一定的文化因素构成, 我们称之为模素。

祁县农民在年节前流传的民谣以及据此为“过年”做的各项准备, 如: 敬天祭祖、祈求上苍赐福, 全家吃团圆饭, 看春节联欢晚会、守夜, 小辈给长辈拜年, 这些都洋溢着骨肉亲情、人伦孝道。届时到处张灯结彩, 在大红大紫的喜庆气氛中互相拜年祝福; 以及“过年”的禁忌, 也都是为他们所普遍遵守和执行的。春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 它是一个地方性群体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的精神连接链, 祁县农民通过供奉神灵祖先, 祈求来年好运, 调适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通过互相拜年、礼物馈赠来调适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在田野考察中发现, 当地农民非常重视大年三十的祭祀和初一清早的“蹲旺香”。“蹲旺香”是保佑新一年出门在外的亲人平平安安, 这在山西“过年”习俗中是很有特色的。祁县位于太原南面, 是一个十年九旱的农业区, 仅靠种地连糊口都很困难, 所以在农闲之余, “农民们便走乡串户做点小买卖来换点零花钱, 甚至在解放前有的人

走西口,到甘肃、内蒙、东北等异乡去谋生。”^④清人康基田在其著《晋乘螭略》中说“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许多人客死他乡。在田野调查中,一位82岁的老人告诉笔者,他的哥哥为了挣到抽大烟的钱,告知家人说去关东,至此杳无音讯。而笔者外婆的父亲和其他一些祁县老乡解放前就在“恰图”合伙做买卖^⑤,几年才回来一次,笔者家中有一个铜制酒壶就是由他从恰图带回来的。现在,当地农民除了种地几乎都“捎带着做点买卖”^④或者到乡镇企业打工。可见从古到今当地农民一直有在农闲时做生意的传统。他们认为,在大年初一清早这一新旧交替的时刻,通过“蹲旺香”仪式,让冉冉上升的香烟把自家人的祝福和期盼带到天上,使上天能够保佑全家人特别是出门人的安全,并给他们带来福气和财气,为来年的出行提供了心理上的保障,体现出他们对生命中的意外祸福是那么的不安与小心。上述种种,作为民俗流行式,是通行于群体中的民俗模式,它充分表达了当地农民祈福避祸的期望。

还有一些是正逐渐为民众所放弃、正在萎缩的民俗模式,比如遗式。我们所熟知的正月初五或初十不出门,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当地人开始对正月初五或初十不出门这一禁忌已不忌讳,有事时,人们也会选择出门办事。还有正月初十给老鼠烧香供献有的人家会去做,有的人家则已不管这些。

以前,农村中会以宗族或街道为单位组成神社,举行社火活动,而今,社火表演以镇为单位,在有关文化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到县城去汇演。如果没有汇演活动,村中以祀神为目的的社火活动已经组织不起来了。此外,一些在历史上曾有的但今天生活中已找不到的民俗模式,则叫废式。

其次有许多老人回忆,在旧社会,穷人“过年”如同过鬼门关。一到腊月,债主就开始上门逼债,欠债的穷人这时无暇顾及如何“过年”。因此祁县农村有腊月初一吃玉米爆米花的习俗,有俗语:“腊月初一不吃炒花^⑥儿,一个起来一个倒”。祁县老百姓认为,吃了玉米爆米花,就能逼走一年的晦气。但就在这吃炒花的同时,债主上门要债了,穷人还不起人家的债,只好装病。所以叫“得病的炒花儿”。

腊月初八,用软米粥供献弥勒佛(人称“吃粥和

尚”),债主又来逼债,穷人干脆躺在炕上继续装病,所以又叫“加重(指病重)的米粥儿”。

到了腊月二十三,用饴瓜瓜供献灶王爷上天,但是债主也加紧了逼债,有的干脆不走,硬要还了钱才走,把穷人逼得用麻片烂棉絮包裹住身体缩在炕上,人们贬称“生了豆芽”,表示实在是没有办法,因此又叫“要命的饴瓜瓜”。离年越近,债也逼得越紧,人们被逼得东躲西藏,有的逼出了人命。

一直到大年初一,穷人才偷偷回到家里,吃饺子过个年,而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好歹又算活了一年,所以又叫“救命的煮角^⑦(读jue)儿”。

在传统的民众社会价值观中,信守信誉是人们恪守的人生准则之一,欠债还钱每个人是笃信不疑的。但众所周知,直到解放前,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很穷,欠钱却无力偿还,这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久而久之,形成一个社区群体的心理压力,无意识地渗透到了祁县“过年”习俗中。

我们从祁县春节民俗模式中的遗式和废式中可以看到,民俗形成的第一推动力是人们的生活需求。当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生活需求与价值观随之也发生改变,于是人们从稳定的民俗模式中开始重新优化选择,从而导致民俗模式的变异。遗式和废式对于民俗变迁有着重要意义。民俗不是一个凝滞不动的概念,恰恰相反,在稳定的传衍中它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异,并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人们一直在为既存的民俗模式增添新的流行式,摒弃遗式和废式,使得民俗不着痕迹地融入到现代生活中,成为仍然活着的民俗。“民俗模式是超历史的形态,这一性质使民俗模式在生活世界里起继往开来的作用,保证生活的传承和连贯,它们既是过去活动的文化结晶,又是新活动的文化依据和蓝本”。^[2]

祁县春节习俗中还有一种单行式是指“具备某种功能的唯一模式和模素,有时是因为它们无可取代,人们的生活中不存在第二种选择”。^[2]通常见于某些禁忌,如嫁出去的姑娘不能在娘家“过年”。并且,在前营村,如果某家一年中有人去世,那么这个人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是不能贴对联的,第二个春节只能贴青颜色的对联,第三个春节才可以贴红色的对联。这些都是严守的禁忌。否则,会招来四方八邻的笑话,被乡邻讥讽为不懂得尊重已逝的亲人,没有规矩。可见,“过年”作为一种民俗模式也是人们用来多项式解读、理解、升华琐碎庸常的生

活际遇、人伦道德,协调自身和群体关系的有效途径。

而在过年这半个月时间的狂欢节日中,人们会有很多喜庆活动。现在,发达的通讯工具,让人们互相拜年的方式也多元化了。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电话、手机短信成为祁县农民拜年的首选,当然,趁节日亲戚间走动走动,礼尚往来,依然盛行。而且,祁县农民“过年”时有的人会一起玩麻将,有的人会到县城里逛逛,有的人会去周围的民居大院、古城墙等地“旅游”一番。在祁县,一直有正月里搭台唱秧歌的习俗,看秧歌,是当地农民最喜欢的事儿,一听说哪个村子唱秧歌,人们会从四面八方赶到那个村子里去看,并在各个村子中,互相传着有哪些秧歌“好手”要出台的消息。这些“过年”的方式,即是民俗模式中的选择式,即指在民俗活动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来选择一种民俗活动方式。

从上述对祁县“过年”模式的分析,笔者认为,节日模式的实质是个体以社区群体的行为习惯和心理定势来行动的。当春节来临时,在祁县流传的民谣便具有了一种极强的文化约束力,让每个个体以一定的秩序运动,最终转化为社区群体的一致行动。在过去贫瘠且单调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过年”曾让人们平素被压抑的吃、穿、玩等欲求得到满足,人们从“过年”中体验到属于人的物质享受和躯体自由的审美愉悦。而今“过年”仍是一种调节剂,让人们在喜悦中彻底放松,让在过去一年里辛苦的人们走进新一轮的日常生活。

(二)“过年”习俗的民俗功能——生活策略性

在笔者的田野考察中,当地民众在“过年”前后几乎是按着上述民谣中所吟唱的那样去安排自己的节日生活的,比如过了廿六后,人们在路面上打招呼会问:“吃喝都做下了吗?”这是一种特定民俗情境下的民俗用语,这种特定民俗情境就是流传于他们中间的节前民谣所说的特定日子该作什么的规定。“民俗作为民间的不成文规矩并非是杂乱无章、毫无秩序的规定。相反,民俗却是具有异常明显程式化和规范化特点的一种社会现象”。^[1]也就是说,民俗具有模式程序性,它是一套完整的表演程式,是民俗执行者在实行民俗时所遵循的,在民间社会中就是人们常说的“按老黄历办事”。

民俗源于生活,人们在生活中保持住那些便利的和有效的活动模式,以便应付反复出现的需要和情境,于是形成了民俗,它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利益。

年节作为一年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隆重盛大热闹的节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为了迎接“过年”,人们在节前有太多的事要去做,纷繁复杂,让人难以理清头绪。长期的生活经验,使当地民众总结出了节前的民谣,而“过年”期间的祭祀、拜年、狂欢,在时间序列上也是固定的,“民俗是‘正确的’生活策略,它们告诉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怎样正确地做事,赋予生活以规律。如果没有民俗提供的程式解放了人们的大脑,人是不能承受的”。^[2]萨姆纳说:“如果在我们可以动手之前我们必须对所有的局面都作出判断,并不得不总是三思而后行,那么,这种沉重的负担是难以忍受的”。而“在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民俗是应付生活中的关键时刻的便利方法”。^[3]

因此,有了“过年”中这些稳定的民俗模式,人们才顺顺当当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年,当人们违反了“过年”的那些规定,就会有一种局促感或不适感。笔者的奶奶在2003年腊月廿三时白天忘了买给灶王爷供献的饴糖,晚上要供献时才想起来,觉得没有饴糖无论如何也不能供献灶王爷,踌躇了半天,最后到邻居家借回麻糖来才开始供献灶王爷。当问知原因,奶奶讲道:“不用饴糖供献一下,总觉得过不去。”这句话道出了千百年来深深积淀在人们心中的节日意识,而在调查中也看到许多的年轻人在向老一代人询问节日中的一些讲究。到了正月里,要走亲戚拜年,对于现在许多农民来说,礼物的馈赠也已经是象征性的了。可见,民俗作为一种模式,是一种便利,也是一种限制,任何因素的缺漏和减损都不符合群体的理念。在生活中不自觉形成的民俗最后成了人们要自觉维护的范式,牢牢地吸引着他们,使他们将其热情、兴趣和精力尽情地投入进去,诠释、演绎着“过年”习俗,这其中虽也有着个别不情愿的成分,但它最终还是成为了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

综上所述,过年是传统社会中农民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创制的一种特殊的“停顿”时刻,通过运作这个民俗模式,来更换自己的心理时间,是“人对自然的把握和利用”。“过年”的意义也如当代民俗学者董晓萍指出的:“年节是民俗的对外开放期,是日常民俗的微缩景观,是按照民俗的样子制造民俗的公共场合,是本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见面的老地方”。^[3]

[注释]

① 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形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引自载《新华文摘》2004 年第 19 期 刘梦溪著《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第 106 页

② 用线捆成的一捆香,有 100 多支

③ 一种用煮熟的小米做成的饭团

④ 被采访人:钱熙端,男,60 岁,祁县前营村村民;采访地点:祁县前营村;采访时间:2004 年 3 月 20 日

⑤ 清代中俄边境线上的俄国的贸易城,在今蒙古阿尔丹布拉克。

⑥ 炒花,祁县方言,指爆米花

⑦ 煮角,祁县方言,指饺子

[参考文献]

[1] 叶涛,吴存浩.民俗学导论[M]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

[2] 高丙中. 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3] 董晓萍. 说话的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M]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The Folklore Pattern' s

Implication of Spring Festival in Qixian County of Shanxi Province

QIAN Yong— ping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The fo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lkore pattem about Spring Festival lies on people' s living condition and existence demands, whose characteristics are stable and variable. Moreover, the folklore provides people with existed strategies. The writer aims to discuss the implication of Spring Festival that an individual arranges his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ty group' s behavioral habits and mental pat- terns.

Key Words: Shanxi; Qixian County; Spring Festival; folklore pattem